

重建中華民族的仁愛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最近中國奧運聖火受到干擾，引起全球華人憤怒，各國以千或萬計華僑華人出來保護聖火。作為一個海外華人，也感受到了那種激情。關鍵的原因，是海外華人也同樣經過中國近代歷史一百多年的苦難，也很明白中國過去的傷痛，是一種文化創傷。華人盼望中國能夠站起來，不只是強大，而且需要一種文化，一個有內涵的中國。中國在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，在全球來說是強大的，但是中國文化的那種感染力，還是不能達到全球的注意，反而以西方列強為主要的文化世界，對中國的興起總是抱有一種懷疑的態度，他們很喜歡中國的負面新聞，卻對中國的正面發展不加重視。所以當發生藏獨的暴亂時，西方片面地聽了藏獨方面的說法，說藏獨是因和平示威而受到鎮壓。然後當藏獨分子破壞聖火時，他們便鼓掌，認為應該如此。結果這就引起了全球華人的一種激情和公憤。

這種激情和公憤的來源就是，華人對新聞材料的理解起碼通過兩方面，一方面是英語的材料，一方面是中文的材料。中文的材料也有非官方的報導，比如香港的傳媒，還有一些其他遊客的報導等等，這些報導都是客觀中肯的。明顯地是先有了殺人放火的暴亂，才有中國的行動，而從遊客所看到的，中國警察還沒有開過槍。所以他們發現西方的報道完全是從藏獨的扭曲事實和欺騙來的，是不公義的，藏獨份子不但破壞聖火，更是破壞全人類文明的和平理想，這樣的做法就讓海外華人憤怒。中國過去是一個受傷的民族，現在要奮鬥和復原，還要在主辦奧運上受到傷害，所以大家走出來保護聖火，一呼百應。此後，聖火所到之處，都有華人的大海把那些藏獨的示威者淹蓋住了。海外華人的這個能量發揮非常大，以萬計人向批評中國的西方政府示威，以及對傳媒錯誤報導的示威，還有網民對西方傳媒的批評，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動。有評論說，西方不怕中國政府，卻怕中國網民，他們也怕作為其國內選民的海外華人。至此西方受了教訓，知道話語的霸權不是永遠只在少數西方的傳媒手中。

當然中國還沒有到達成為一個大強國，中國文化還沒有到達一個全世界尊重的地步，但是，我們也要明白，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、一個文化的興起，還是需要時間去讓人去理解的。如果我們看在歷史上，德國的興起過程中也受到很多的批評，法國、英國、美國在興起時都有其它國家的敵視和批評。美國直至現在，世界各地都有示威批評美國。所以一個大國受到示威抗議是正常的。我們應該學香港《亞洲週刊》評論家所說：「放鬆一點，我們是大國」。我們已經是一個慢慢發展成功的大國，雖然還沒有到完全成功的地步，不過我們已經擺脫了過去百多年的苦難所控制的中國，我們已經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希望。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太多的憤怒，怕別人批評，反而需要更多反省自己，更多發展出一個跟全球先進文明接軌的文化和制度，才可以慢慢免除他人的批評。人家要批評，我們不能只是罵他人，還是需要讓自己做得更完滿，要激勵自己做得更成功。這一切在西方話語霸權之下，我們除了作有力的反擊以外，也需要作出更深的反省。

就在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在這個年代意義時，一個偉大的文化思想家王元化去世了。過去曾有「南王北李」的說法，現在則有「南王北錢」的說法，李是李慎之，錢是錢鍾書，王元化為什麼同李慎之和錢鍾書合起來比較呢？錢跟李是非常不同的，但兩個人合起來就是王元化的特性。李慎之是一個很敢講真話的知識份子，錢鍾書是一個做學問非常仔細的學者，王元化大概是把兩方面都合起來，一方面王元化敢講真話，另一方面他做學問也很用心，他對學術的要求非常嚴格，是兩方面的結合。一九九五年，我們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剛成立，《文化中國》剛創刊，舉辦第一次「文明衝突與文化中國」研討會時，他是少數從中國來加拿大參加會議的中國學者之一，而且住在我家。我記得帶他在溫哥華海邊走的時候，天氣有點涼，問他要不要戴一頂帽子，他很幽默地說，我一生戴的帽子太多了，所以不需要再多戴一頂。當時我對他的過去理解還不多。記得有一次在吃飯前，我說要紀念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沒有飯吃，所以我們應該為生存而感恩，也願意向國內來的朋友說一句「願天地的愛與你們同在」。這時見到他眼中滾滿著淚水。為什麼他有感動？後來，我到北京參加他主持的《文心雕龍》研討會。第一天晚上，北京古城到處是初春的風沙吹過，白髮蒼蒼的他走進我的

房間，在昏暗燈光之下，他向我訴說了其悲劇性的生平。他告訴我他原本是一個基督徒，自少就受到愛的教育，也在飯前學習感恩。作為名教授的父親在清華大學是基督徒，故此從小就有基督教的信仰，但後來看到日本侵略中國，搞華北「特殊化」運動，坦克車開到街頭欺壓中國人。他很憤怒，希望能參加革命去改造中國，所以就走上了革命的路，而不是傳統基督教的路。不過他在上海當地下黨員時，在租界那段歲月，跟他的姑媽住在一起，每天跟她一起讀聖經和禱告，又影響了他有一種宗教的悲憫情懷。他非常投入革命，後來中國革命成功了，他很高興，可是在「胡風事件」中，張春橋負責審查他的看法，他認為要對黨講真話，坦白地提出自己看法，以為胡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，但不能算是反革命，他說「毛主席也可能會有錯」。在那年代講這些話很嚴重，之後被抓去坐牢。他說，那時候心中實在非常痛苦，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發生，後來並產生了精神病，一直到出獄病才好。但接著文化大革命又受到批判，病又復發。在改革開放初期，他等待平反之時，卻沒想到同自己相依為命也是學者的太太張可，中風昏迷，醒來後行動非常不方便。王元化認為自己過去所受的種種災難，自己的太太一直在承擔，對太太和兒子有一種歉疚感。雖然他後來名氣很大，但心中總有一種震撼靈魂的痛苦，實在也是很深很深的創傷。

就是這樣，那時候在北京，風沙吹過大地，在小小的旅館，昏黃燈火話平生，聆聽他心中所經驗的痛苦，實在很明白中華民族過去是受過的創傷，而這個傷是需要安慰。所以，後來我再去看他，跟他對話幾個小時，漸漸談到愛，談宇宙的愛。他說上帝大概是人類的道德根源，人類之所以有這樣的良知和道德原則，就是來自上帝。我說，西方基督教文化一面上帝是道德，但另一面上帝也是宇宙的一種親情，一種慈愛，人是可以體會到的。他表示他願意去體會這種愛，請我和他一起禱告，共同與上帝作一溝通，那段時刻十分神聖肅穆，老先生進入靜思的境界。之後，我們又見了幾次面，每一次我都看到他新的觀點，新的突破，每一次到最後他都請我祈禱。我看他寫過的東西，覺得裏面特別的地方，是他早年很重視什麼是真實的，真實的東西不只是看到的事物，而且是可能的事物，真實的東西也包括精神上的真實。所以由於這真實的要求，就成為他一生都講真話的動力，他在政治上最容易遭到批判的年代還是講了真話，這代表他的忠實，真誠的性情。同時，王元化對現代化帶來的思維的毛病，也作了很多很深的思考。有一次他跟我討論到啟蒙運動，他說從西方的啟蒙運動到五四運動，一般都說是講啟蒙，重點是重視理性，重人的能力，但是他覺得過分重視人的理性和人的能力的話，也會把這個東西絕對化，而變成一種意識形態，變成一種以理殺人的以為真理在握的心態，構成思想的定罪。所以他說如果要繼承五四時，也要省思，事實上五四也帶來一種思想定罪的思維方式，人反而應該有一種更自由更發揮自己思想的創造力。而且，最後問他宇宙的真理是什麼，他覺得宇宙最後的真理是愛。人是有限的，也有很多罪，故人應在宇宙大愛面前謙卑。愛是最後人生的答案，最後人生的意義。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談話，他就強調這種對宇宙大愛的追求和體會。我想，他應該也是一個不斷祈禱的人，這好像孔子所說，「丘之禱久矣」。他不斷地以心靈和宇宙的愛來溝通，雖然常常講真話會得罪人，但生命中總是有一種永遠的包容和仁愛的動機在後面。

這裏我也想起已故李慎之，多年前曾來過加拿大，住在我家。他問我有關對真理的體驗，對真善美的體驗，然後跟我談起宇宙起源時的大爆炸，從大爆炸發展到現在，如果沒有目的話，是不可能的。宇宙一直發展出人類，最後的目的不是把人毀滅，他認為不能僅僅從無神論來談科學，而應肯定宇宙與人的存在應該是有目的的。這兩位中國偉大的知識份子，在晚年都同樣走到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宇宙是有意義、有目的、有真善美愛的真理。他們所思考的，可能正是中國文化應該有的出路。中國自古都是承認真善美愛的一種文化，而這個文化經過多年的發展，當然有時扭曲成為政治上的一種意識形態。不過到現在中國人重新站起來發展的時候，以和諧作為發展的最高精神，真善美愛的思想可能是我們這個年代需要重新重視的，不但是講，而且要行出來。

本期《文化中國》即將付印時，四川世紀性的大地震震動了全國，也震撼了全球華人的心，大家同心同德救援災民。從冰雪災到地震巨災中，中國人在艱難中表現出堅忍奮鬥，及可貴的互愛互助精神，在救援隊未到時，大家已在徒手救人，彼此關愛。地震時總理第一時間到了現場，救援隊也迅即到達，在廢墟中救回無數生命。這次災難使中國人發現生命和仁愛的可貴，遠勝於金錢，如耶穌基督所說：「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而失去生命，又得到甚麼呢？」這次上下一心的挽救生命，已令全世界為之改觀，對中國的表現評價極高。基於中國人這堅毅剛勇，重視生命價值的精神，我相信北京辦奧運，一定會成功，這個成功不是僅僅面子上的，更重要的是把中華民族那種仁愛精神重建起來，向人類宣佈中國文化是仁愛為本的，能對全球化作出貢獻，這樣中華民族不只是經濟強大，而且更是一文化大國。